



趙之境 (原名趙志軍)

鞍馬畫的當代轉型

中國繪畫史中，鞍馬文化蔚為大觀，其嬗變軌跡深嵌於時代精神之中。從唐代韓幹、曹霸筆下彰顯帝國氣象的廄苑良駿，到北宋李公麟寄託文人清趣的筆下逸品，再到徐悲鴻時代化為民族怒吼的筆墨符號，「馬」的形象始終超越動物本身，成為特定歷史階段集體意識與審美理想的核心載體。

然而，步入以和諧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代，傳統的鞍馬範式面臨着必然的現代性轉化課題：它如何超越以往或為權力附庸、或為個性投射、或為救亡圖騰的敘事，從而生發出與當代人心靈狀態相契合的新穎表達？從美術史的角度來看，這是一個新課題。

在古代與近代，馬的核心價值緊密關聯於軍事、交通、勞力等實用權力體系，其繪畫形象自然也難以擺脫「鞍轡」的束縛。而在當代文明語境中，馬的實用功能極大消退，其文化意象則朝向精神領域昇華。我對此有切身的體會。我的童年記憶扎根於內蒙古烏蘭察布的草原，那裏的馬是沉默的家人，那種源自生存本能的堅韌與溫情，構成了我理解馬的精神原初圖像。

當我後來生活於香港，這座中西交融的國際都會，馬的形象則呈現出另一重現代面貌：牠既是沙田馬場上關乎速度與激情的都市儀典，也成為本地藝術家筆下充滿思辨與實驗性的文化符號。香港同行們的多元探索——或融匯



●《逐光千里》紙本設色
124cmx248cm(2026年)
作者畫作

應。因此，優秀的當代鞍馬創作，已不再是古代範式的重複，而是成為連接歷史文脈與當代精神、東方哲思與普世情感的審美橋樑。

縱觀古今，鞍馬畫的流變如同一面明鏡。其當代轉型的深層意義，在於成功地將一個承載厚重歷史的繪畫門類，轉化為參與塑造當代文化性格、滋養民眾心靈的藝術形式。它證明真正的傳承，是以個人真實而複合的生命體驗為熔爐，以敏銳的時代感知為引，在古典母題中開掘出能與時代心跳共振的新維度，這或許正是中國畫脈永葆生機的核心秘密。



沈西城

巴金喜歡吃什麼？

巴金的作品裏，我最喜歡的是他晚年寫的《寒夜》，藉一家人抗戰時在重慶的生活，折射出顛沛流離時代的困境。巴金愛妻兒，晚年寄居上海，住洋房，生活優悠，主要是版稅優厚，手邊有一份資料，記錄了巴金在1962年到1966年的收入，不妨存錄這裏，作為參考。

1963年度的收入，主要是人民文學出版社（簡稱：人文社）重版《春》的稿酬1,107元，其他還有人文社重版《秋》的稿費1,414元，再連同其他出版社的稿費，全年合計有3,609元。1964年度主要收入是長影匯來的《團圓》稿酬1,500元，另外還有《收穫》《萌芽》的267元，全年收入共有2,087元。1965年度收入銳減，僅198元。有一點要作說明，就是這三個年度因社會活動繁忙和文壇形勢緊張，是巴金一生創作和作品出版的低產期之一。

在高產期時，收入驚人，巴金說：「解放後，我的書開始銷路大了，1951年《家》出版後，加上以後又再版，因此到1964年為止，我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就拿到共22萬多元稿費，後在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拿到幾萬元稿費，另外在解放初期一些小出版社也拿到一些，還有翻譯稿費……解放後一共收入30萬元左右。」在當年，這是天文數字了。巴金每月家庭開支約四五百元，因此庫存不少，生活豐裕自在。巴金愛吃，日記中，多次提到衡山飯店吃西餐，1963年4月1日，寫道「六點一刻後和蕭珊帶小林、小棠到衡山飯店西餐部吃晚飯。」在那年代，實在不得了。

有說巴金是四川人，謬也，原籍浙江嘉興，可他喜歡吃四川菜，其弟李濟生這樣寫他哥哥——「難忘家鄉味，基本上是圍繞着川菜來的：素炒豌豆尖、麻婆豆腐、水煮肉片、蒜泥白肉、樟茶鴨等都是巴金常常想吃的。」晚年臥床醫院，想起吃的，還是魚香肉絲、臘肉、乾煸牛肉絲。吃粥時，喜歡佐以唐揚豆腐乳、皮蛋等。作家李舒在《老巴金》一文裏如此說：「有一次，有個親戚做了三道川菜：回鍋肉、水煮牛肉、麻婆豆腐，巴金吃得津津有味。」足見他對四川留戀之情，遠勝於嘉興。巴金也愛喝咖啡，衡山飯店西餐部「紅房子」是他常到之地。

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6年2月10日(星期二)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

車淑梅

「陶瓷藝術創新大師」詹培明

合，出來就是金碧輝煌。」

「那是用了瑣娜彩技術和特殊印刷的顏料，那技術是我當年從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學到的，他們請來了英國的專家作各式印刷培訓，同學們學習電子印刷，而我學習了冷門的陶瓷花紙，我一心要提升國家陶瓷工業水平。結果那兩套瓷器領導人都非常滿意，國家博物館更提出要作收藏。當天人民大會堂的人員出席那個典禮，見到了如癡如醉：嘆？我們金色宴會廳就是缺少一套這樣金碧輝煌的陶瓷……就是這樣，我們的產品便走進北京人民大會堂了。」

其實，詹培明還有另一特別身份：「國際野外鳥類攝影名家」，不少高手都向他請教，「以前工作太忙，但60歲之後可以遙控，我開始到全世界去找尋野處美自然美。我曾寫過7次遺書，因為我見到肯尼亞的直升機非常老爺，看似隨時跌下來，我先寫一封，飛一次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，安全着地後我把遺書撕掉，下次再寫。我見到很多設計的元素都是來自野生動物和鳥類，為什麼我不讓自己去捕捉那一瞬間與眾不同的經典？更可堂正地說，這是我的版權、我的知識產權。」

詹培明一直是業內的傑出推手，廠房

更是深圳五星級的工業旅遊點，他總是強調做人要老老實實地做好自己，不要以為自己是誰，慢慢積累起來就會有所成就。對的，北京有京派，上海有海派，現在深圳有深派，而我們香港也應該做好「港派」。祝大家快馬加鞭、馬上跑出，正如詹培明的祝福——馬年人人好兆頭，無憂愁！



●詹培明祝大家馬年人人好兆頭，無憂愁！ 作者供圖



陳復生

桌上足球機

許久沒有玩桌上足球了，這天經過俱樂部的兒童樂園樓層，巧遇久違了的桌上足球機，顯眼佇立在中央位置，見少兒們玩得不亦樂乎；曾幾何時，這裏也是我和女兒們的開心地……

每逢假期，在俱樂部下午茶或吃飯期間，總會逗留片刻，跟每個遊戲設施玩樂一番——桌上足球機往往最耗時，讓大家捨不得離去。這項遊戲雖然只在小型桌面上進行，但要專注集中，過程充滿緊張敏捷，是一項能訓練快速反應的親子互動遊戲。

桌上足球機又簡稱足球機（Table football 或 Foosball、桌式足球或足球枱），是一種在桌面上的足球遊戲，規則源自於足球規則，遊戲的玩法是透過控制桿（設計成不同位置的足球員），將球移動到對手的球門中（入網）。

桌式足球的起源不詳，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第一台足球機出現在1880年代至1890年代的西班牙、法國或者德國。美國稱之為 Foosball，西班牙稱 Futbolín，意大利稱 Biliardino。在智利被稱作 Taca-taca，而在一些其他西班牙語國家則被稱之為 Futbolito，法國將其稱之為 Footie 或 Baby-foot，總之，這玩意源自西方。

第一次接觸桌上足球，是1978年在

TVB宣傳部的辦公室，那時候的TVB仍在廣播道，我主持的娛樂資訊節目K-100，屬宣傳部製作，是電視界首個雜誌式宣傳節目，也是TVB創立宣傳部的時候。由於電視大樓騰不出空位，整個宣傳部唯有臨時搭建在停車場空地上，設施簡樸無華，也是創意無限，收視率頻頻報捷之時，當年的K-100節目，經常同翡翠劇場爭叮噹馬頭，位居冠亞之列，常駐200多萬香港觀眾。

這部足球機佔地不大，可是大家空餘閒暇的小玩意。當年還在浸大上學的我（浸大就在廣播道附近，步行不用10分鐘），每當課餘就往電視台跑，忙完幕前主持工作，就到宣傳部學習，足球機自然成為新潮玩伴。

後來，父母知道我對桌式足球越來越喜愛，就特別從外國訂購了一部足球機，讓我們一起在家中作樂……想不到，這少年時的玩意，竟又傳承下來，令人回味不已！



●桌式足球機 作者供圖



查小欣

陳松伶 勇敢火鳳凰

陳松伶（松松）是典型火鳳凰重生，認識她時她早已憑《天涯歌女》一劇爆紅，十多歲，是個天真爛漫的少女，但因與家人在前途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，導致她離家獨自在外與友人生活。好景不常，未幾，環境發生巨變，一切在意料之外，結果她身無長物，要靠自己隻身求存。她不知所措，迷失，對任何人和事都失去信心，於是跑到內地，希望在陌生的地域，洗刷對過往人和事的痛苦記憶。

當時她向我哭訴，我給她的忠告是接受世事無常、人心難測，平伏情緒其中有效方法是不停向人複述整個過程，直至說時不再傷心地哭，這是心理學家教的法門，她照着做，果然日漸見效。

人善天不欺，在她經濟陷入困境時，幸得張學友前經理人陳淑芬做救星，起用她做學友歌舞劇《雪狼湖》內地版女主角，除解決了她生計問題外，亦令她精神有所寄託。



●陳松伶2月28日開個人演唱會，當然要去捧場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朵拉

文公子手記

上任約一年的上海商業銀行（上商）行政總裁，近日宣布離職。網上見有不少議論，細閱內容，可能是你抄我，我抄你，都說上商專做中小企生意，見之不禁搖頭。

上海商業銀行於1915年，由陳光甫在上海成立。1949年後，陳光甫南移到港，香港分行遂變總行，後來更在港註冊成為一間本地華資銀行。由於在上海經營多年，本身已擁龐大客源，因此當時也主要服務南來的上海大企業，不少製衣紡織業知名企業如南聯、南豐、永新等都是客戶。而上商在出入貿易融資上，也頗有專長。上商與邵氏關係尤佳，因此可於電視城內開設辦事處，專門服務電視台的職藝員，已故的邵逸夫爵士也曾任上商董事。

文公子大學畢業後，由於自知未夠資格

送灶君

過年前，家裏總有一件事繞不開：送灶君。媽媽一邊搖頭，說年輕一代越來越不重視這些儀式感，一邊卻又把這件事放在心上。她向來不迷信，平常頭燒耳熱一定看西醫，至於喝符水、吃香灰這種事，她說只是心理安慰。可一說到節慶，她卻格外堅持。對於媽媽來說，儀式不是求神，而是為了把日子好好送走、再迎回來。

過年前的瑣事一件接一件：大掃除、買年貨、做年糕。那些年糕，大多是為了送人。媽媽總說自己親手做的，才是真心誠意。忙到差不多了，她還要「送灶君」。文章裏多半寫「送灶神」，但在媽媽的語彙裏，用的始終是「灶君」，聽來更親近，也更像家裏的一位老熟人。

農曆二十八，是媽媽認定的日子。她說，那是灶君上天、向天帝稟報一家善惡的時候。其實各地說法不一，中國北方多在臘月二十三送灶，南方多在臘月二十四，也有人拖到臘月二十六、臘月二十八，各隨家傳。媽媽不太管這些版本，她只認自己從小跟着長輩做的那一天。那天，她把供品一一備好，點上蠟燭和香，雙手捧着燃着的香，對着灶君的牌位低聲念着。她說的話年年一樣：請灶君保佑國泰民安，全家平安健康。我問她，國泰民安是國家的事，和我們小百姓有什麼關係？她想也不想，說，國家不安，百姓怎麼安？聽着也對，便不再爭辯。

平日拜拜，媽媽總要大費周章煮上一大桌菜，全是娘惹式料理，香料

重，滋味濃。對我們來說，每一次拜拜，多少也是為了那一餐趕回家。可拜灶君，卻不一樣。桌上一定要有年糕，而且是會黏嘴巴的那一種。

這是南洋承繼下來的講究。家家戶戶各有自家的灶君，要送他上天見天帝，自然希望他說的都是好話。甜甜的年糕，黏住嘴巴，讓話說不出來，就算說出來的，也都是甜言好語。吃了甜的灶君，替這一家多說幾句好話，也算人間的一點小心思。

送走了灶君，到了正月初四，各家再把他迎回來。重新點香、換新灶紙，讓他回到廚房，看這一家如何繼續過日子。對媽媽來說，這一送一迎，像是給一年畫上句點，又替新的一年點亮火種。她或許不相信神明真的上天入地，但她相信，把這些事好好做完，日子就不會亂。於是，在臘月的煙火與甜氣裏，灶君被送走，也被記掛着。而那些看似「迷信」的動作，其實更像一代人，用盡力氣守住的生活秩序。

迎接灶君的日子，同樣沒有統一。各家各戶自有家裏的規矩，我們是在年初四。那天不論多忙，都要在天還未亮時先把這件事辦妥。送灶君可以遲，迎灶君卻一定要早。媽媽說，遲點送上去，灶君也許來不及把壞話說全；早點迎回來，就更沒有時間再添枝加葉。她說得一本正經，聽起來，神間與人間，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同。清晨的廚房還帶着夜色的涼意，香一點起，灶台便重新有了

銀行家的格言

為人師表，決定投身商界。當時，見有銀行招聘見習行政助理，主要做應用文撰稿與內部刊物的編務工作，心想應該勝任，於是去函應徵。招聘的原來就是上商。經過筆試與面試，文公子有幸獲聘為見習主任。不過由於有專長，經過兩天迎新培訓後，就與其他見習主任分道揚鑣，他們前往各部門巡迴學習，而文公子就落戶固定部門工作。當時，文公子被編派到總行的研究室，跟隨研究室主管兼公司秘書朱嘉華先生工作。當時的主要職務，包括閱讀經濟研究資料和協助撰寫報告予管理層參考。由於該職位須兼顧內部員工刊物《海光通訊》的編採與出版工作，而主責部門「海光室」則位於旺角分行。因此，文公子當時每日上午先在旺角上班，下午與同事一同下班，回總行工作。

上商承襲了十里洋場的運作，並非一間傳統的家族式經營銀行，且頗注重企業文化。當年每位新員工入職後，都會獲發一本由陳光甫親撰的手冊，內容主要闡述企業文化，也有待人處世之道。文公子記得其中一句格言：「與人相處，須能盡量委曲求全。」當時不解其意，只覺有點窩囊，因此印象深刻。待日後服務企業大老闆們，相處日久，開始領略箇中道理。

華資行與外資行相比，薪酬競爭力不高，但人情味就比較濃厚。除非犯上大錯，也不輕易辭退員工。有部分部門，雖也時見辦公室政治操作，但更多時，同事們都能融洽相處，頗有家庭氛圍。由於上商非家族式經營，所以最高管理層，歷年都由同事升任，由基層奮鬥到最高層者大有人在。新總裁空降聘來，未知是否未能融入文化？